

白红兵 唐棱棱 著

學術、政治與意識形態

梁光華題

——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与文学变革研究

川出版集团
蜀書社

贵州省重点学科——中国古典文献学建设经费资助出版
2012年贵州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项目成果

学术、政治与意识形态

——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与文学变革研究

白红兵 唐棱棱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学术、政治与意识形态——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与文学变革研究 / 白红兵, 唐棱棱著. —成都: 巴蜀书社, 2013. 4

ISBN 978-7-5531-0204-7

I. ①学… II. ①白… ②唐… III. ①近代哲学—思想史—研究—中国 IV. ①B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38909 号



学术、政治与意识形态

——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与文学变革研究

白红兵 唐棱棱 著

策划组稿	何 锐
责任编辑	侯跃生
封面设计	张 科
封面题签	梁光华
内文设计	古 蓉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 (028) 86259397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 (028) 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四川机投印务有限公司 (028) 87487333
版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210mm×148mm
印 张	10.75
字 数	260 千
书 号	ISBN 978-7-5531-0204-7
定 价	28.00 元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联系调换

序（一）

红兵的博士论文就要出版了，这真是令人欣喜的事情。记得多年前红兵在北师大文艺学专业攻读硕士学位时就是最用功的同学之一，在我的课上，他那专注听讲的样子、提问时那认真严肃的神态都还历历在目，就像昨天才发生的事情一样。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位善于思考，喜欢追问，能够提出个人独到见解的年轻人。后来他到中山大学师从在诸多领域均卓有建树的著名学者高小康教授攻读博士学位，我深信在导师的督责、引领之下，他肯定会成长为一位成熟的青年学者。去年我读到他的博士论文，切切实实地印证了我对他的这一看法。

在中国文学史上，“近代文学”是一个十分特殊的阶段。这自然是由于“近代”是中国社会史无前例的重要转型期：旧的东西开始崩坏，新的东西正在孕育；传统文化的主导地位受到挑战，中西融会的文化格局拉开序幕。在列强的刺激下，中国人现代民族国家的观念与意识开始形成。残存的文化优越感、民族自尊意识、来自西方的民主意识、救亡图存的危机感和强烈的民族自卑感混杂交融，造成知识阶层无比激烈的内在冲突与焦虑，像猛兽一样啃噬着他们的心灵。就知识阶层的身份而言，一方面他们身上依然流淌着传统文人士大夫的血液；另一

方面又接受了来自异质文化的影响；一方面他们依然捍卫和践行着儒家传统的伦理道德，另一方面他们又开始形成现代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与求真精神。总之，包括文学家在内的整个近代知识阶层也和他们所处的时代一样，处于转型过渡之中——从传统文人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过渡。对于上述种种情形，在近代文学观念的发展演变中都有所显现。或许正是因为近代文学这样一种“不古不今”、“不中不西”的独特形态，使其不便归属，因此历来不受重视，时至今日，在高校的学科体制中“近代文学”也不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学科或研究方向——或者被视为古代的延伸，或者是现代的上溯，专治此学者鲜有其人。只是近年来在海外学人的启发下，国内学者才稍稍提升了对近代文学的研究热情。

红兵的博士论文正是选取这个时期的文学观念作为研究对象的，他力求呈现出这一研究对象自身的种种复杂性，其学术眼光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他的研究视角、思路乃至结论都是独到的，决不人云亦云，撮其要者，可由下列几个方面见出：

其一，独特的研究视角

这部著作深入研究了三个个案：朱次琦、康有为、梁启超，这三个个案的选择可以说是很有学术眼光，颇具匠心的。一者，三人是递进的师承关系，一代传一代，在思想和学术上血脉相连，从某种意义上看具有一种整体上的关联性，故而可以作为一个大的研究对象。二者，三人代表着中国近代文学观发展的三个阶段，他们每个人都具有相当的代表性，通过对他们的研究可以窥见近代文学观念发生发展的大致脉络。三者，他们都是岭南人，具有地域文化上的一致性。因此，选择这样三个个

案作为研究对象，就可以使个别性和一般性、特殊性与普遍性很好地结合起来，既揭示出他们之间思想和观点上的异同，为关于朱、康、梁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又可以从一个角度揭示中国近代文学观念发展演变的整体面貌，并进而对我们深入理解现代文学观念的形成提供前提。

更重要的是，朱、康、梁的思想发展历程确实呈现出清晰的由体制内走向体制外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又折射出那个时代思想文化转型的基本路线，近代文学正是在此历程中，在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出于政治目的的大力推动下方才逐步成形。从这个角度来看，论文选题本身就显示出一种敏锐的学术眼光。

其二，突出的理论概括能力

红兵在《绪论》中说：“理论并非需要在作品中特别指出的东西，它的终极目的在于为学术思考提供相应的思维模式”。我认为，不是所有博士论文都能清晰地意识到理论的这一用途，相反，大篇幅脱离具体问题的理论阐述倒是时常可以见到。

红兵的这部著作采用实证方法，非常重视史料的征引与考辨，同时更显示出很强的理论分析与概括能力。例如在分析晚清文学研究现状时，并没有像一般的学者那样仅仅罗列出各种观点，然后指出这些观点还如何如何存在种种不足，以此说明自己的研究如何必要，甚至可以“填补空白”云云。红兵的分析是深入、透辟的，他认为晚清思想的研究经历过两次转向，形成三种基本研究范式，并把这三种范式概括为：“去西方化”、“冲击——回应”和“兼顾中西”，考诸史实，我们就会发现这样的概括是合理的，是真正研究之后才得出的结果；再如，红兵对所有问题的论述都能从多方面提供多重史料，又没有把自

己的观点强加给史料，而是对史料进行合理的分析、解读，注重史料之间、史料与结论之间的逻辑联系，故能做到让史料自己说话，这就必须具有极强的理论概括能力。可以相信，文章的史料是难以推翻的，论证过程是合乎逻辑的，所以结论也是可靠的。

其三，善于重构具体文化历史语境

这部著作对朱、康、梁三位思想家的研究可以说是落到实处的，即处处联系具体的文化历史语境展开论说与辨析，而不是仅仅就他们的文章、著述架空设论。例如对朱次琦思想中表现出的“实学”精神的讨论就联系了岭南自宋明以来逐渐形成的治学路径，使人了解到朱次琦的思想形成的深层文化渊源。而康、梁对“实学”观念的继承，以及对“实学”观念施行领域由朱次琦单纯的理论蕴涵到康、梁向学术、政治和意识形态并最终至文学领域的拓展等，都既能照顾到历史文化语境的重构，又抓住了近代文学生成的首要推动因素；其他如对康有为经学思想的形成、康有为误读西方文化；康、梁之间的离合关系、梁启超“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乃至对朱、康、梁三人之间学术、政治和思想、文化的传承，身份的转换等方方面面的问题都能置于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层层深入、抽丝剥茧地进行分析。我认为，只有立足于具体史料，采用重建历史文化语境的方式才能准确、客观地揭示三人间的传承关系。红兵的研究方法是严密的，无懈可击的，也是走在学术前沿的。

由于研究对象选择得好，又有合理的研究路径，红兵博士的这部著作不仅对康、梁的学术渊源进行了清晰梳理，而且在一系列具体问题上都有独到发现，在相当程度上推进了相关研

究的进展。

红兵博士年富力强，学术兴趣正浓，倘能持之以恒，积极探索，不断超越自我，必将取得更为辉煌的成绩。

李春青

2010年1月31日

序（二）

红兵学弟的博士论文《中国近代文学观念的传承与裂变》要出版了，这对于红兵自己攻读博士学位的几年辛苦总算是个交代。这本书在学术上有多大份量，当然要由方家评说，由历史定讫。但在这篇博士论文乃至即将付梓的书中凝聚了多少辛苦，只有作者本人冷暖自知。我作为他的指导教师，其实也能够体会到一点他乃至他的家人为了这篇论文所付出的种种辛苦。

选择康有为、梁启超作为文艺思想史的研究课题，从学术价值来说显然没有问题。然而这两位先哲深受学术界关注，已经被研究得太多，令刚刚进入学术研究的青年学子难以措手，因而往往知难而退。红兵则不同，他显然是属于另一类知难而进的学者，即所谓“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者有意选择了这样一个难以更加深入的课题。

在过去“千古文章一大抄”的年代其实这样选题也没有什么问题——无数篇文章、无数部专著在同一个名家、同一部名著或同一个概念中低水平重复打转转，这几乎是学术研究的常规现象。不过在越来越讲创新、越来越重视保护著作权的今天，“千古文章一大抄”的做法肯定是越来越行不通了。在这种情况下再去沉潜到一个可能已被过度开采的矿井中去，非但难免一

无所获，说不定还会遇到冒顶或瓦斯爆炸的风险。这倒不是说大家、名家和名著已无可研究了。实际上，越是大家名家和重要学术问题，在学术界往往越是容易形成习惯的共识，即使有争论，也不免陷入成见的套路中。看看过去多少年来许多大的学术讨论热点：“诗言志”的“志”是什么意思？《文心雕龙》所“原”之“道”是儒家之道还是道家之道？《水浒传》反映的是农民起义还是市民生活？《红楼梦》的主题到底是什么？如何理解“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理论内涵？“美”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诸如此类的反复争辩往往在有限的视野和狭窄的逻辑域内集中了大量的研究，造成了无数学术论著的“撞车”，而对于大家、名家和主要理论的认识却仍然局限在某些特定视野内而丢弃了更广阔、更深入探讨的空间。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于大家、名家和重要理论问题的探讨还大有可为，问题仅仅在于如何去做！

红兵的研究选题应该算是在这个已被耕耘多遍的土地上找到了新的处女地。他的论文从康有为的老师朱次琦入手，寻找康、梁师徒两代学术和思想奇人的学术渊源所自，将论述内容限制在朱次琦、康有为、梁启超三人政治、学术、和文学观念的传承与裂变上，这样，朱、康、梁三人组成一个相对连贯的影响发展线索。康、梁二人是以维新出名的，过去的研究也因此而较多地关注于他们思想的“新”的方面。这种研究视野当然不能说有错，但可能会忽略了“新”中的“旧”，即思想传承的意义。但引入了朱次琦后情况就不同了：朱基本上属于传统士大夫类型的文人，他的学术思想带着明显的传统观念色彩。在清代后期的思想文化背景下单独研究他似乎有点背时，难以

体现时代的思想文化发展特征。但作为康、梁的老师，朱次琦的思想其实属于一个正在发展蜕变的新思潮形成过程。有了他，我们才更容易认识这个时代文学思想的发展动态。从某种意义上说，思想史的研究应该是对思想观念形成、演变的活的过程进行的研究，而不仅仅是对固化了的经典文本的释读分析。红兵的博士论文正是因为这种研究思路而有了自己的价值。

然而许多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如果从朱次琦入手就能找到新的研究线索，别人为什么会想不到？问题不仅在于朱的思想本身不够新潮，而且更重要的是他留下的东西太少。朱次琦虽然是晚清岭南学派的标志性人物之一，但由于去世前“尽燔其稿”，所以导致后人的研究困难。红兵在朱次琦弟子简朝亮搜集整理的《朱九江先生集》、再传弟子张启煌《朱九江先生讲学记·注》和朱杰勤“斟录”的《朱九江先生谈诗》、《朱九江先生经说》等遗册中仔细爬梳，搜寻出朱次琦的思想脉络以及对康有为的影响。在他看来，朱次琦传给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并非具体的学术主张，而是“经世致用”观念。他的学术观念犹如一个“母体”，潜在地蕴涵着多种可能的发展方向，比如由简朝亮到邓实、黄节便与康、梁这条线索存在显著区别，如果洪秀全确为朱次琦学生的话，那又是与前两者截然不同的第三条线索。他分析其中的缘由在于朱次琦并不鲜明地反对任何学术主张，比如虽然他“倾向宋学”，但“兼采汉宋”还是其学术基调；朱次琦素以理学家名世，但并不鲜明地反对朴学，而且还提倡朴学的研究方法，因而视野比较开阔，对后学的影响也就有可能从多方面展开。对朱次琦学术思想的价值以及影响如何评价或许有不同见解，但红兵的研究成果的确有助于更深

刻地了解近代文学思潮的发展过程。

书有自己的命运，红兵学弟的这本书出版后学界如何评价不必多虑，购书读者有多少也不必管他。毕竟这不是时下可以畅销的东西。然而如果后来的研究者有可能从这本书中多了解一点东西，我想也就够了。如今不好说文章是千古事了，但得失的确确是作者寸心所知。从完成博士论文答辩到呈献于世，算是学者可以了却一件心事，也不枉红兵以及红兵的家人辛苦了这么多年。所以写下这几行字表示我的祝贺之意吧。

高小康于祈乐苑

2010年1月31日

前 言

近代岭南在多灾多难的中国绝对是个开风气之先、豪杰辈出的所在，从这里走出去的一批批志士仁人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康有为、梁启超便是当之无愧的个中翘楚。

在晚清或近代思想研究领域，康、梁始终是个热点，仅在Cnki上，以“康有为”、“梁启超”为关键词，检索结果就分别达到44304和86748条。这些研究基点是将康、梁置于中西文化关系和清王朝即将大厦倾覆两大语境中，集中揭示康、梁政治、学术和文学等观点。这种研究思路一个不言自明的结论就是康、梁政治、学术和文学观点生成的前提为中西文化关系和清王朝即将大厦倾覆的历史文化语境。结合晚清文化现实和康、梁的实际文化旅程来看，这个思路和结论虽有相当的合理性，却也是不充分的，这就给本书留下充分的论述空间。

传统研究对梁启超以下两句话要么视而不见，要么语焉不详：一是“启超之学，实无一字不出于南海。”二是“有为既从学于朱次琦毕业……欲自创一学派，而归于经世之（致）用。”这其中显示的是由朱次琦经康有为到梁启超的师承关系中“经世之用”的传承线索。

朱次琦是晚清岭南学派的标志性人物之一，由于去世前

“尽燔其稿”，后人难以窥探其学术观念的真实面目，对他的研究也极其薄弱，Cnki上只有区区11条，这显然与朱次琦的“岭南大（醇）儒”身份极不相称。

本书首先立足朱次琦弟子简朝亮搜集整理的《朱九江先生集》、再传弟子张启煌《朱九江先生讲学记·注》和朱杰勤“斟录”的《朱九江先生谈诗》、《朱九江先生经说》，还原朱次琦学术和文学思想的本来面目：学术观念继承白沙、尊崇亭林、“兼采汉宋”、“无今学，无古学”，主张“四行五学”，所有学术观点（念）的核心素质是“经世致用”；文学观念显示出彻底的“古典性”。

朱次琦学术思想没有过分倾向任何学术观念或立场，故而犹如一个“母体”，潜在地蕴涵着多种可能的发展路向，康、梁便是其中之一，本书揭示的正是这条线索中学术、政治，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文学观念的实际发展状况。由于文学观念绝非独立于学术和政治观念之外的孤立存在，故本书具有学术、政治和文学三个层层递进的基本层次，全书和每一编都采用从学术、政治入，复从文学出的结构模式。论说中除了前述两大语境外，朱、康、梁的师承关系和其中的“经世致用”线索是一个重要创新点。

在朱次琦那里，“经世致用”只是一种理论蕴藉，表现为学术观念既远离政治，又指向个人、指向内心，促进个体知识积累、人格完善和道德提升。此后出现以逐步“渗透”为表现形态，以“经世致用”为内核的持续“外转”过程，“渗透”路径为学术—政治—文学。

在具体学术观点上，康有为是朱次琦的坚决反对者，但在

学术和政治观念层面，“经世致用”理念却被康继承并“滥用”，推导出“通三统”、“张三世”这类怪异的学术理论。与此相反，“经世致用”并未“自然”地“渗透”进文学观念——康有为显然没有意识到不但学术和科技领域需要“师夷长技以制夷”，文学也需要“师夷长技”。他在学术上“师夷长技”的做法与传统的“经世致用”理念相激荡，无意中产生的客观效果却撼动了传统文学观念的理论基础，这是康有为在朱、康、梁这条文学发展线索中的过渡性作用。

在梁启超手中，“经世致用”不但“渗透”进学术和政治，更前所未有地提出“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等理论，将“启蒙”和政治任务赋予文学。这类“革命”具有重大文学史意义：生成前无古人的“典范转移”和“文学何为”的文学观念新命题，颠覆了文学史上“古典意识”和“文以载道”、“藏之名山，传之后世”，以及以诗文为“正统”的古典文学观念，在中国文学史上首次树立以“西方”为典范，以现世为“用”，以“小说”为正统的文学观念，这是近代文学观念的基本内核，也开启了“五四”文学运动的先河。

另一方面，在梁启超那个时代，文学之“美”在商业之“利”和启蒙之“用”的夹击下被消解殆尽，加之梁启超诗歌和小说观念在理论表述、创作实践上各自都存在万难调和的内在矛盾，因此，与“五四”文学相比，梁的文学观念呈现出显而易见的“未完成性”。在朱、康、梁这条线索中，建立在政治与学术基础上，在“经世致用”理念的推动下，伴随着近代知识分子的生成过程，逐步完成的是文学观念由古典到近代的转换。

与朱、康、梁学术、政治、文学观念由古典走向近代相伴

相生的是三人身份上的“超越之旅”，即由封建士大夫，经“儒家知识分子”，到近代知识分子的跨越，这是本书论述的第二条基本线索。

本书目的有二：第一，还原朱次琦学术和文学观念原貌，并发掘他在中国学术和文学思想由古典到近代转换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二，将康、梁学术、政治和文学观念研究从传统的中西文化纠结、交织和清王朝即将大厦倾覆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剥离出来，另行建构以师承关系和“经世致用”为线索的基本生成语境。

本书以 1876—1903 年为主要论述时间段：前者为康有为从学朱次琦之年，后者为梁启超及其同道基本完成近代知识分子生成和文学观念由古典到近代的转换之年。

绪 论

一、研究动机

相对于古典文学和现当代文学来说，近代文学研究一直是个薄弱环节，甚至前二者在各高校和人文社科研究机构中早已被设置为专门学科的情况下，近代文学的研究范式、研究历史、研究群体，乃至研究成果等方方面面都显得严重不足，——古典文学研究者顶多将近代文学视为一个辉煌灿烂的文学传统身后一条不那么光鲜靓丽的尾巴，不值得为之付出多少时间和精力；现代文学研究者也将近代文学视为现代文学发生的背景，基本上不会作为研究中心对待。打个也许不恰当的比方，如果古典文学和现当代文学是亲生父母一手养大的话，那么近代文学顶多只是“后娘养的”，——“营养不足”不说，由于近代文学创作水平无法与古典和现当代文学相比，在将艺术水平与研究价值直接挂钩的传统研究者那里，近代文学还多少有些“面目可憎”，这也是一个无庸讳言的事实，甚至在近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已经卓然有成的北师大中文系杨联芬女士也感慨万千：“阅读晚清小说，与其说是阅读文学，不如说是阅读中国近代以来